

無可避免地疊壓重複，缺乏貫徹始末的邏輯引導。例如第三、四章均大幅描述朝鮮造籍制度，第五章與第七章則重複性考察了戶籍大帳中「都已上」的運作機制。其三，本書以比較史視野考察東亞傳統社會結構仍有提升空間。宮嶋博史指出「中國文明的樣態在唐宋變革期前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的文明對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產生了更為絕對的影響。唐代為止對於中國文明的接受主要是國家體制層面的接受，宋代以後的接受則涉及整個社會的廣大領域」。如何看待唐宋變革後東亞一體性的減弱，是東亞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作者聚焦於中朝戶籍制度固有其學術價值，但若將日本、越南乃至歐洲的戶籍登記與職役制度綜合納入比較範疇，方能全面立體地呈現東亞內部的共性特徵與個性路徑，更好地理解東亞社會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內在機制。

常宗政

山東大學歷史學院

**葉少飛，《越南古代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452頁。**

越南是早期漢文化圈的主要成員之一，其受中華文化影響較大，歷史時期曾與中國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聯繫，在官方文字記載的史料和民間散著中，都可見其身影。但長期以來，我們對這一「鄰國」認知有限，越南始終是「熟悉的」他者。新近出版的葉少飛所著《越南古代史學研究》（以下稱「葉著」）一書，從史學思想史入手，對越南國人所著史書進行了系統梳理。該書通過對越著史書版本的詳細比較、辨析，以史學思想為切入，對越南史進行全方位闡釋，書寫越南古代史，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高度概括越南文化，即「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越南以儒家文明為主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印度化的占婆文化和東來的歐洲文化，形成了今日多元燦爛的越南文化」（前言，頁1）。這種由史學思想透視越南文化的研究路徑，具有開創意義。

全書共由14章內容和總論構成。第一章以黎文休1272年所撰《大越史記》為主導，系統分析其成書歷程，並深入辨析其與杜善《史記》、陳周普《越志》等史籍之間的關係，指出黎著應在杜著之前，而陳著當在黎著之

前。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黎著的影響和史學思想，指出「黎文休確立了南越國統並構建了完整的國統體系，深刻影響了後世史家對國統的認知與建構，對政治與歷史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頁33）。因黎著正文早已亡佚，所以在分析時，作者主要通過對後期史書中以「黎文休曰」的引用方式出現的史料進行比較和分析，將我們帶入《大越史記》中，從而理解黎文休的思想的淵源和轉變，指出「黎文休編撰《大越史記》之時朱熹思想尚未傳至越南，黎文休的撰著體現了越南古代對前朱子時期的中國史學和儒家思想的理解、運用與創造，因其書散佚，僅可知其一端」（頁33）。黎著不僅在編撰方法上深受中國早期史籍影響，中國史籍中的「國統」「正統」「大一統」敘事也深刻影響了黎文休。

第二至第四章，分別對《安南志略》（成書於1307年）、《大越史略》（成書於1377—1388年間）和《大越史記全書》（成書於1479年）的編撰思想和成書歷程進行分析。作者指出「《安南志略》是現存編撰時間最早的、由越南古代人編撰的史籍，是越南歷史和中越關係史研究的重要著作」（頁35）。作為越人所著最早的史籍，黎崱的《安南志略》在編修時「一方面繼承了黎文休《大越史記》的思想和內容，另一方面則根據中國史學傳統及典籍進行修訂，以達到既符合中國史學要求又表述了越史觀點的目的」（頁41），從而使這本史著兼具「中國和越南史學特點」。《大越史略》則是越南學者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刪削黎文休《大越史記》而成的史書」。該書在越南長期失傳，明初傳入中國後被編入《四庫全書》，後又回流越南（頁60）。葉少飛通過考證《大越史略》版本、作者等，指出「《大越史略》的內容最接近越南古代第一部史籍《大越史記》，因《大越史記》亡佚，《大越史略》的地位顯得格外重要。而《大越史記全書》則是越南古代最重要的歷史典籍之一，是越人吳士連在《大越史記》和潘孚先《史記續編》的基礎上完成的15卷本史著，後因《大越史記》和《史記續編》亡佚，成為亡佚二書部分內容和史論的主要載體，使其得以流傳至今。《大越史記全書》「承」接了亡佚史著的眾多內容，所以成為了解越南古代史不可或缺的史著。葉著第四章重點對《大越史記全書》的成書過程、版本、刻印和雕印時間等進行詳細的比較分析，並以圖表的形式呈現《大越史記》版本流轉情況。

第五至七章通過大量第一手資料和表格形式，集中系統分析《大越史記全書》的版本、編撰體例等，並對《大越史記全書》中「尊正統，明國統」「書法」等方面進行論證，指出《大越史記全書》「十五卷繼承了黎文休開

創的編年體通史的傳統，從史學思想上則完成了孔子到朱熹的轉變」，而其後黎嵩、范公著等人所著史書多依朱熹綱目思想史。（頁150）

第六章對內閣官版《大越史記全書》的編撰體例從「紀」「本紀與外紀」「本紀實錄」「全書」4個方面進行比較和闡釋，並對范公著撰述體例、武瓊《大越通鑒通考》（1510）和黎嵩《越鑒通考總論》（1514）進行比較分析，指出「越南歷史學家根據《春秋》《史記》《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外紀》《通鑒續編》《性理大全書》等典籍的體例，在編年體通史《大越史記全書》中創設了『紀』『外紀』『本紀』『本紀實錄』『本紀續編』等多種撰著體例，並以『全書』統稱為《大越史記全書》，這既是越南史家根據本國史事做的體例選擇，也是對史學思想的發展和創造，幾代歷史學家整合多種體例於一書的編撰方式是史學發展的一個創舉」（頁171）。這樣的評述是極其深刻的，葉著在熟知所分析史書的基礎上，高度概括這一時期越著史書的思想變化及其特點，在闡明其與中國史書體例和思想相關的同時，進一步看到這些產自中國的史書體例、思想在越南的本土化實踐。為了進一步說明《大越史記全書》的「思想發展和創造」，葉著專闢第七章《大越史記全書·鴻龐紀·蜀紀》析論。該章追溯《大越史記全書》中〈鴻龐紀〉〈蜀紀〉的出處，指出「〈鴻龐紀〉和〈蜀紀〉是吳士連採集越地的故事傳說集《嶺南摭怪》中的材料，借鑑《舊唐書》刪削《越南志》的編纂方法，效法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以炎帝神農氏為越南國史起源，建國設制，體現了越地文明之興」（頁188）。吳士連所採用的這種方法無疑具有開創性，為後人所繼承。〈鴻龐紀〉作為越南國史的開端，也被後世越南史家所接受。

第八至十章則對1514年至1776年間出版的具有史書性質的文本進行分析。第八章集中對成書於1514年、黎嵩所撰的《考總論》進行分析，旁徵博引地論證《大越史記統考總論》所涉及的「正統論」問題及其與朱子史學的關聯性，認為黎嵩雖秉承了朱熹綱常之道論史，但「史論不同於著史」，史論的思想性更為突出。為進一步闡釋黎嵩的史學思想，葉少飛從黎嵩的儒佛觀和理學觀兩個層面進行分析，指出黎嵩在論史時，「皆以儒家立場出發，指出政亂諸端，雖代有賢臣，但君臣不守聖賢之道，以致亡國。故佛教禍國亦只是一端而已」（頁209）。黎嵩深受儒佛理念影響，在治史時雖有儒家立場，但也辯證地看待佛教的問題，同時高度認可朱熹綱常之道，並對其理學思想進行綜合運用。

第九章集中分析成書於1520年的《詠史詩集》。《詠史詩集》為黎聖宗

洪德十八年（1487）進士鄧明謙所撰，越南於李朝（1010—1225）乙卯年（1075）開科取士（陳仲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頁103），自後歷朝皆有延續。進士出身的鄧明謙深諳中國史籍撰述體系，並熟知越人所著史籍，其藉助中國傳統史書編撰中的紀傳體史事的編撰方法，以《大越史記全書》為根據，「吟詠越南歷史人物，以詩論史」（頁213）。最終完成《詠史詩集》。作為集前人所長的一部史著，《詠史詩集》「以史文注詩」，兼具「詩教」傳統和蒙學特點。這種以「詩」論史早見於《詩經》，《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雖為「詩」，但卻記述了先秦時期的諸多史事，為後續研究提供了史料。《詠史詩集》雖以「七絕詠史」，詩是其重點，但詩文下注史文（來自《大越史記全書》），所以不失一部「史著」。

第十章對均成書於1676年的《重刊藍山實錄》與《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實錄》的政治史觀進行分析。較之前分析的各史籍而言，此二書的出現乍看與葉著全書違和，但緊跟作者的步伐，不難看到，這兩本史籍的重要性。《重刊藍山實錄》對史籍書寫體系做出了規定（如黎朝帝王名諱的書寫和臨讀），某種程度上為後續史籍的撰述確立了「國家標準」。作為同一時期成書的《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實錄》直承《重刊藍山實錄》所定標準和政治觀念，「總結了莊宗以來中興黎朝的歷史，對其中涉及的重大政治問題進行闡釋定論，樹立的政治史觀進而影響了之後百年的史書編撰」（頁231）。史書重在延續性，中間環節或重大定論的缺失勢必會導致「斷裂」，《重刊藍山實錄》與《大越黎朝帝王中興功業實錄》恰是之前史籍和後續史書的橋梁，在承前的同時，為後續史籍的編撰確立標準。

第十一章集中分析1749年黎貴惇所著《大越通史》，通過分析其版本、體裁、體系及其「論」「序」等窺見中國史學對越南史學的影響。《大越通史》是現存越南古代唯一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編撰時大量加入文書制度等體裁，在保留豐富史料的同時，也體現出黎貴惇對「史體和史法的理解和掌握」。而黎貴惇深諳中國古代史學，所以在編撰《大越通史》時，「採入了大量中國史家的史論、史觀和修撰方法」（頁294）。可見《大越通史》不僅是一部越南斷代史書，更是中越史學交流的產物，見證了中越文化的交流及影響。

第十二至十四章，集中圍繞《大越史記》及其續編進行分析，重點對比分析史籍版本問題，繼而集中呈現1665年至1868年越南史學的情況。

第十二章以內閣官本《大越史記全書》與《大越史記本紀續編》為考察

對象，從內容、修史傾向及價值等多個層面進行比較分析，進一步明確了內閣官本《大越史記全書》的地位和價值。第十三章則對《大越史記全書》的評論與改編性著作——《越史標案》與《大越史記前編》進行比較分析。吳時仕所著《越史標案》對《大越史記全書》的評述，在思想和內容上對《大越史記全書》提出挑戰，「提出『外屬』和『內屬』的概念，強化了雄貉國祖」（頁361）。吳時仕之子吳時任，以其父所編《越史標案》為基礎，以其父史學思想為主體，結合《大越史記全書》編成《大越史記前編》。與吳時仕不同的是，吳時任是「受命修史」，因此《大越史記前編》的成書是以官方力量整合既有越史著作，重塑越南歷史文化的舉措，所成史籍雖與《大越史記全書》重複內容較多，但仍不失為一部優秀的史書。第十四章則集中對越南阮朝的通史編撰進行梳理，重點對成書於1847年的集賢院《大越史記》和1868年國史館的《欽定越史通鑒綱目》進行分析，點出阮朝修史的目的性，以及所修史書的地位。書的最後以總論的形式再度提振全書，將史學與國家歷史的構建相關聯。

整體觀之，葉著在寫法上以史學思想史為切入，通過比較越著史書，整體再現越南古代史，繼而將這一「熟悉而又陌生」的鄰國古代史，全面呈現給讀者。每一章都是一篇獨立的論文，每一章內部結構縝密、論證充分詳盡，但各章節合成一本書，初讀有種「混亂感」，如第四章分析《大越史記全書》及其版本問題，第十二至十三章又再度論述《大越史記全書》。但事實上，這種編排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即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以時間為線索，梳理和比較越南古代史籍，行文至第十一章，古代史籍版本在時間軸上均已呈現，史籍的連續性得以彰顯。第十三章通過對兩部依托《大越史記全書》而作的史籍進行評述，旨在說明這一時期越南史學思想的轉向和國家構建，看似「倒回」《大越史記全書》，但事實上是在進一步分析史學思想。通過第十四章對19世紀越南史籍編撰情況的分析，在邏輯上形成一個閉環。同時為便於閱讀，作者用心製作了大量表格和示意圖，為讀者理清思路，整本書全面體現了作者治史的水準和能力。史學史研究難度極大，沒有大量心血的投入和刻苦鑽研，難成如此浩瀚之作，如國際知名越南研究學者丁克順所言，「這部著作體現了作者的心血和研究成果，我給予高度評價」（〈序一〉，頁3）。

馬斌斌

紅河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